

“堵、贵、累”让黄金周过成了“黄金粥”，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迎难题——

我们的假期该怎么安排？

本报记者 甘哲

“十一”又至，根据此前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今年“十一”期间旅游接待人数将到达4.8亿人次，交通部预计出行人数则达6亿多人次。

这是全国假日办由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取代之后的第一个黄金周，同样伴随着争议声来到，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提出取消“十一黄金周”，改为1天法定假日的建议，让如何放假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堵、贵、累”让群众“花钱买罪受”，那么是否应该再取消一个黄金周？公众的休假权利如何得到满足？是否能顺利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我国的假日制度该何去何从？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难题。

黄金周争议再起

黄金周制度迄今已实行15年。1999年，

国务院公布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确立每年的春节、“五一”、“十一”各放假3天(加上调休共7天)；2008年，取消“五一黄金周”，把清明、端午、中秋3个传统假日新增为法定节假日。

此前，公众调休假设定具体由全国假日办负责。9月15日，全国假日办撤销，其职能并入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中。

“假日办”取消了，但关于假日的讨论并没有消失。

“我们关心的是假日，不是假日办。”在经历了“挤掉双休日、拼凑小长假”、“除夕不放假”等一系列举措后，许多人如此感慨。

9月25日，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教授提出，取消“十一黄金周”，将国庆节的法定假日由目前的3天调整为1天，剩下两天分给元宵节、重阳节两个传统假日。

这让很多人抱怨，“专家折腾没了‘五一’，又来折腾‘十一’了。”

对此，蔡继明回应：“我说取消‘十一黄金周’有前提条件，是全国各地各单位都能严格执行带薪休假制度。目前，带薪休假执行得还不太好，所以这个条件还不成熟。”

黄金周过成“黄金粥”

黄金周制度施行后，确实刺激了民众的出行欲望。旅游、休闲、购物等一系列活动对于拉动内需作用明显，但也带来不少烦恼：路上堵、门票贵、行程累，黄金周过成“黄金粥”。

今年“十一”期间出行人数依旧火爆。半个多月前，铁路售票网站就显示，10月1日当天所有车次的车票在开售几分钟内被“秒杀”一空，10月2日的车票也一抢而光。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十一”期间，道路客运

量将达到6.3亿人次，日均9000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预计增长5.0%。

历年“十一黄金周”全国接待游客数量一直呈递增趋势，14年间增长了6.2倍。自2008年“五一黄金周”取消后，“十一黄金周”的拥堵程度一年高过一年。到了2011年，“十一黄金周”游客数量首次突破3亿人次大关。

2012年国庆前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重大节假日高速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通知，进一步助推了节假日旅游出行的火爆。当年，“十一黄金周”游客数量同比暴涨40.9%，达到4.25亿人次，高速路变身“停车场”。

除了交通部门的压力，黄金周的集中出行也给各地景区带来难以承受之重：泰山爆满，庐山疯堵，鼓浪屿几乎被“踩沉”，华山万人滞留，西湖见人不见桥，九寨沟景区游客滞

留……相伴而来的是管理、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一个黄金周，亿万人民“花钱买罪受”。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何建民说，热门景区在节假日屡屡爆棚，其实是集中爆发的游客需求与热门景区承载能力之间的供需不平衡。

我们的假期谁做主？

有评论这样形容被取消的全国假日办：“假日办最大的贡献，就是引起了整个社会对‘休假权’的认知。”

携程网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愿意通过带薪休假去旅游的受访者占50%。今年携程网进行了同样的调查，比例上升到了80%，但愿意通过黄金周出游的受访者只占18%。今年两会期间，腾讯网的一份吸引了3万多名网友参与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人希望恢复“五一”7天长假，理由是带薪年假制度落实不到位。

目前带薪年假权利难以落实的困境，让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刘思敏认为，在带薪年假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的情况下，我们目前仍然很需要黄金周。

许多受访者表示，即便全面落实带薪年假，也很难满足家庭出游的需求。随着公众休息休假权利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未来黄金周是去是留、假日制度如何改革，将是考验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一个重大课题。

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冲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内容。这些特点赋予它恒久的生命力。从那时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中国成就档案

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结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是为处理中国与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的。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中印双方签署协定的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同两国签署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时公之于世的，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并迅即引起重大国际反响。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印度、缅甸等国领导人时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冲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内容。这些特点赋予它恒久的生命力。从那时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上接第1版)

今天是玉树市去年全面重建完成后迎来的第一个“十一”国庆节，眼下的玉树虽然天气已逐渐转寒，但街道上热闹非凡，众多游客在重建一新的格萨尔广场上拍照留念，一场场歌舞盛会中洋溢着节日的喜悦。

26岁的康巴小伙杂松成林是土生土长的玉树人，这一天他依旧要为自己的生意而忙碌，听到街道上传来的歌声，有着藏族能歌善舞天性的他忍不住哼唱起来。杂松成林告诉记者，2010年的大地震使他的家夷为平地，现在他和全家人住在重建一新的藏式独栋建筑中。去年警校毕业后，他带领75名来自玉树的大学生创办了“玉树青年创业协会”，加工、出售一些藏族传统工艺品。

从黑龙江大庆，到吉林长春；从江西井冈山，到深圳蛇口；从边境口岸，到江浙水乡——各地人们在10月1日这一天同庆新中国成立65周年，共同祝愿祖国明天更美好！

“共和国功臣不能忘记”

(上接第1版)

虽然年过九旬，但吴少梅谈吐清楚，精神矍铄。首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颁奖……几十年过去了，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对于劳动，吴少梅依然充满着眷恋与热爱。谈起自己的工作经历，她淡然地说：“我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尽着自己应尽的责任。”

“这幅照片我保管了几十年，现在我要把它送给省劳模办。”吴少梅说。

“这是一份厚礼，你们一定要保管好！”苏树林对一旁的省总工会工作人员叮嘱道。

“新中国成立65周年，福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一切凝聚着每一个劳动者的汗水与奉献，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在全国劳模、福州市第二中学原党委书记郑捷的家里，苏树林对这位在三尺讲台上倾其所爱，用生命守护“师道”庄严的“母亲”表示赞许。

“发挥正能量、传递正能量，一代代功勋卓越的奉献者用青春和创造汇成人生长河，感召和激励不同年代的人们，投身伟大事业，共同推动时代不断走向进步。”陪同慰问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张广敏说道。



昆明寻甸县推出“十个严禁”

对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的干部行为进行重点约束,500多名干部签字承诺

本报讯 (记者黄榆 通讯员李艳梅)9月19日,在昆明市寻甸县县委工作会上,县委书记武斌郑重签下“十个严禁”承诺。随后,全县548名副科级以上干部,都在《寻甸县领导干部落实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十个严禁”承诺书》上签字并承诺。

夯实基础促民生

(上接第1版)

“目前，中央对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普日哇介绍，团结发展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最根本任务就是要把改善民生摆在最突出位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社会条件。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委宣传部部长刘应校说，针对会议提出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的要求，当前民族地区学校在依法办学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各自在民族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模式、

据县纪委书记董国新介绍，“十个严禁”主要针对党员干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政纪律等方面。涉及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对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的干部行为进行重点约束。

“十个严禁”明确规定，严禁违反政治纪

突出特色谋发展

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办学特色，进一步提高了办学水平。

会议指出，要把优势资源开发好、利用好，推动产业结构上水平，加快发展服务业，逐步把旅游业做成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土地使用、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建设等方面给予差别化支持。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是革命老区和回族集聚区，民族地域文化独具特色。海原县文广局副局长李进兴说，近些年当地政府不断从文化中发掘发展潜力，既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也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效促进当地百姓致富。

“代表者维护者”，恪守天职见忠诚

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召开座谈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20周年。对于这部与每个劳动者息息相关的重要法律，许多曾参与此法制定、推动出台的工会干部和法律专家们感慨道：《劳动法》开启了中国劳动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在《劳动法》颁布后的20年里，在工会组织的大力推动下,《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数十部涉及职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出台。与此同时，地方工会参与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超过千余件。

力推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出台，主要基于工会为切实维护职工权益的现实判断：面对普通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收入偏低、增长缓慢，拖欠职工工资现象时有发生，企业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安全事故、职业病等问题突出，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不公引发的劳动争议居高不下等问题，借助法制的力量，努力做到主动依法科学维权，当成为各级工会的不二选择。

其实，以法制作为维权工作的依据和手段，一直是中国工会的优良传统。

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各项权利和工会的法律地位，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还

(上接第1版)

工会是社会经济矛盾特别是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天职。

翻阅中国工会运动史可以看到，即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会组织也始终坚持为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存在和工作，虽然这个目的往往是通过动员和团结工人群众参加和支持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来体现和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了建国初期十分注重履行维护职能，后来相当一段时间过于强调维护职能而忽视维护职工群众具体利益的“起伏”后，以中国工会九大为新起点，中国工会开始在全国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突出维护职工权益上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

1983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研究《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提纲》等文件时，明确提出“工会的性质和任务应当在党的领导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为工人阶级办事的组织”。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劳动关系的多元化、复杂化，一些地方和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1994年7月颁布的《劳动法》第七条规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年底，全总十二届二次执委会提出了以贯彻实施《劳动法》为契机和突破口，进一步突出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工作总体思路。

在总结维权实践的基础上，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修改后《工会法》作出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中国工会十四大以

来，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工会维权理论进一步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特别是针对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现实，中国工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提出了“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树立了“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工会维权观，确定了“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企业工会工作原则，并提出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两个普遍”的工作重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完善不断丰富内涵。

当然，这样的理论总结，主要源自工会维权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拓展：

——协助党政解决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深化送温暖活动，加强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建设和职工法律援助工作，在加强帮扶中切实维护职工的权益；

——提出“农民工有困难、要维权找工会”，把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和维权帮扶工作中，为农民工提供办理入会、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应急生活救助等一条龙服务；

——创新工会组建的工作思路、组织体制和方式方法，探索成立了楼宇工会、一条街工会、项目工会、社区工会和区域性、行业性工会组织，并探索建立了“义乌模式”、城际维权联动机制等行之有效的维权机制。

可以说，这些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标志着中国工会对维权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日益深化。

不断推动工会工作法制化，切实做到主动依法科学维权

今年7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